

罗时进 著

地域·家族·文学

清代江南诗文研究

罗时进 著



地域·家族·文学

清代江南诗文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罗时进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25-5720-2

I. ①地 II. ①罗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华东地区—清代—文集②古典散文—文学研究—华东地区—
清代—文集 IV ①I207.22-53②I207.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7456号

本著作出版得到苏州大学211工程项目资助

责任编辑:盖国梁

校对人员:李晓荷等

地域·家族·文学
——清代江南诗文研究
罗时进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4.75 插页5 字数400,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5720—2

I·2251 定价:4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 言

近 10 多年来,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江南研究颇为学术界所关注,而历史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方面,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果能够显示地域性因素进入学术视野后,在认知上可以达到的高度。这种重视地域性因素的学术取向,无疑对江南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可以成为推进江南文学研究的引擎。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我将研究的侧重点逐步转移到江南地域和家族两个方面,并试图由此展开对清代江南诗文的研究。

众所周知,较早认识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并付诸研究实践的是近现代学者,学界最熟悉且最多引用的是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国地理大势论》等论文。他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学术文化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为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上生活,物质上生活,还直接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他深切感叹“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①。此外,刘师

^① 《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全集》第 4259 页,北京出版社,1999 年。

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也颇为学者所推崇。他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具体到文学层面加以讨论：

声能成章者谓之言，言之成章者谓之文。古代音分南北，河、济之间，古称中夏，故北音谓之夏声，又谓之雅言。江、汉之间，古称荆楚，故南音谓之楚声，或斥为“南蛮缺舌”。……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

刘氏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不仅分析了南北语言和文体的不同，还以时代为序论列了南北文学风格的差异，颇多精辟之见。这方面还需要提及的是在刘氏之后汪国垣（辟疆）曾撰写过《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开了研究某一文体与地域关系之先河。虽然辟疆先生谦言那只是他“欲于最短时间，举此五十年内之有名诗家逐一论列，非为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抑且无以统摄之，势必散漫无纪，絃一漏万……无已，姑从地域言之”的一个非自觉的研究方法的尝试，然而以下论述仍从学理上显示出他对地域与诗歌创作存在内在关系的认识：

若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溯溯源于既往，昭轨轍于

^① 《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202～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方来，庶无就焉。况正变十五，已肇《国风》；分野十二，备存《班志》。观俗审化，斯析类之尤雅者乎^①。

文化，像一切生命体一样，总是在一定的母体中萌生、发育、成长，它无可选择地带有其生命的基因，尽管它在发展中可能具有某种超越性，但超越性是与连续性共生的，连续性的原点即是继承。继承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文化根性”。这种“根性”形成的原因自有多端，而地域自然环境及其风俗，必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何谓“风俗”？刘师培曾给予一个颇为独到的解释：“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俗’字从人，由于在下者之嗜欲也；‘风’字训教，由于在上者之教化也。”^②如果这一解释有据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某种“文化根性”的形成，不但与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文明的“在地化影响”有关，也与地方自然生态环境有关，与地方民情习尚有关。

文学，是文学家的产儿，是文化中最富于生命意识和感性活力的部分。如果要追究其“根性”的话，就不但要从地域自然环境及其风俗中寻“根”，而且应注意文学家所生长的家族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地域和家族二者之中，家族更据有核心的地位。对于文学家而言，家族是其被直接孕育并与之血脉通连的母体。因此，文学研究必当重视家族问题，至少在研究古代宗法社会背景下的文学家、文学作品时，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应有其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① 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第291～2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② 《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家族主要指文化家族。中古以降,学术和文化虽在国家 and 地方两个层面运行,但重心不在庙堂而在地方,多呈民间化、私学化倾向。所谓地方,主要显现于郡邑清华世家。这些著姓大族之支撑门户虽然不能脱离政治权力,不能脱离家族经济,但更多凭借的却是家族文化。若论其间关系,与其说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孵化、催成了其家族文化,倒不如说是家族文化奠定了其政治地位基础,并巩固了其经济力量。因此,我们可以从一般意义上将这些清华世家定义为“文化家族”。

文化家族对文学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下三端尤为突出:

首先是家风。家风是一个家族的世德、门风,是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这是文学家成长的精神环境,也是无形无质却影响深刻的精神财富。历代文学家不少都创作过歌咏先世俊德盛业的“述祖德”类作品,无非都是表明门第清华且精神遗传世代不绝。如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其一)“达人贵自我,高情属天云。兼抱济物性,而不纓垢氛”云云,是对家族“清尘”高绝和济世功业的赞颂;潘岳《家风》诗所称“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云云,乃是对家族庭训和道德取向的铭感;而皎然《述祖德赠湖上诸沈》所称“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雪飞梁苑操奇赋,春发池塘得佳句”云云,则是对先祖文学和文品的礼赞。显然,无论是功业盛德、伦理祈向,还是文章盛名,对于后代文学家来说,先祖昭灼的嘉言懿行,都是家族传统的不朽典范。在平常时日,它是家族文化教育的示范读本,而当“后世子孙日繁,德业日微,既不克绍承遗烈,且泯

灭是惧”时^①，祭出家族世德门风，则成为高门甲族的自我拯救之道。总之，家风是文化家族的精神旗帜，标志着高贵的血统和风雅的承传，成为他们守护的根本，也激励他们慎终追远，振奋高华精神，是其以文传家，使门风不坠、宗脉永隆的动力源泉。

其次是家学。家学即家族世代相传之学，包括学术、文学、艺术等，是家族文化修养。钱穆先生在讨论中古世族门第时曾说：“（其）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史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合并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表现，则成为家学。”^②清人王嘉禄为吴中嘉道间著名文学家沈清瑞之子彦曾《兰素词》作序时，曾盛赞其词“循节揣声，动谐律吕，有空灵之气，有宕往之神，有凄惻之采，有绵邈之旨。”他感叹道：“是非原本家学而又得山水清气以为之助，乌能及是耶！”^③这里，王氏指出沈彦曾《兰素词》的风格和成就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地域因素，另一方面就是家学因素。家学，或以训导灌输的长期教育，或以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不但对家族后代的学术方向、知识积累发生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文学创作上对家族后代的文体选择、创作取向、作品风格产生某种影响。学界常提及的所谓经学家族、史学家族、诗学家族、艺文家族……无不是就其家学传统而言，如若学养不同，则“嗜趣自异，假使创作文学也便不能一样”。有学者举证“刘宋的谢灵运世为江南甲族，由是他的诗歌遂‘丽典新声，络绎奔会’”；韩愈创作载道的古文，“与他的环境有关，

① 尤侗《述祖诗小序》，载《西樵尤氏续修宗谱》。

②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1963年第5期。

③ 王嘉禄《兰素词序》，载王氏编《吴中七家词》。

他本来就生长在古文的家庭”^①。这种对创作缘由和文学风格的批评也许未必具有普适性,但认为家学对古代作家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是不违背文学史史实的。如果不是将这种影响视为“唯一性”的,而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则完全可以强调到“无法忽视”的程度去加以认识。

再次是家脉。家脉是指文化家族构成系统及其延伸的姻娅脉络。如果说家风对文学家的影响在于精神指向方面,家学对文学家的影响在文化修养、创作内容及其文学风格方面,那么家脉则是在组织形态和互动势态上直接影响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文化家族中,文学家的出现一般不会是个体性的,而具有群体性特征,因此便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家庭自师友”的现象。如宜兴储方庆与其兄储善庆为康熙进士,方庆有五子,也均为康熙进士,方庆孙辈同样倾心文学,多有功名。“储氏父子兄弟间,自相师友,颇以能文章世其家”^②,形成了一个蜚声海内的家族文学群体。另外太仓“太原王”锡爵之后,咸能不坠家风,一门之内,自相师友,艺苑驰声。时敏之子王撰即云“昆季共九人,参差不一致。大都守家风,未失祖先意”。“济济歌《槭朴》,烨烨咏《棠棣》。家庭自师友,古道相砥砺”^③。从组织形态上看,家族本身往往就成为一个有序的文学创作群体,家族之脉越兴旺,则创作互感互动越劲盛,文学成果也越丰富。血缘亲族之外,文化家族往往还有一个复杂交错、关系纷繁(如累世婚姻、连环婚姻)的姻娅脉络。由于坚持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情况下建立家族婚姻关系,因此,其姻娅脉络实际上成为在原

① 罗根泽《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三《作家的创作缘由》,《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23~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② 储大文《存研楼二集》卷二十五《在陆先生传》,《四库》未辑本。

③ 王撰《丁酉初夏雨夜偶成一百四十韵》,载《王异公诗稿》。

有家族基础上扩张的文学网络。这一姻党外亲网络,同样成为文学创作互感互动的平台,甚至被设置成文学创作的现场。一个规模宏大的文学群体乃至文学流派,正是在文化家族之“家脉”发展中得以产生。

地域和家族对文学的影响在江南表现得相当突出,可以说“江南”是文学研究中特具典型意义的地域文化、家族文化样本。

学界至今对于如何解释“江南”、定义“江南”,认识尚不统一。我认为从自然生态、经济水平、人文环境三方面加以综合考量,大致可将环太湖地区称之为“江南”。此即一般意义上的吴文化地区,以明清时期苏、松、太、常、嘉、湖五府一州为主,也包括杭、镇两州的部分地区,其经济、文化中心在苏州^①。对于江南地域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高启在《送唐处敬序》中曾不无骄傲地说:“尝以为一郡一邑有抱才艺之士而出于凡民者,皆其地之秀也;若诸君其诸州之秀欤?以诸州之秀萃于一乡,吾里何幸哉!”^②高启这里虽然只是就“吾里”苏州与“才艺之士”而言,实际上隐含了“江南之秀”与“文学之才”盛出的关系。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论及“江左派”时有稍详的分析:“江浙皆《禹贡》扬州之域,所谓天下财赋奥区也。其地形,苏则有南北之殊,而皆滨海贯江,山水平远,湖沼濛濛;浙则山水清幽,邻赣、闽者,亦复深秀。……江浙山水,既以绵远清丽胜,故人物秀美,诗境清新,有一唱三叹之音,无棘句钩章之习。文章得山水之助,其信然欤!”^③辟疆先生将“山水平远,

① 参见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第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冯贤亮《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

② 高启《凫藻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江辟疆文集》第309~3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湖沼潏洄”的“山水之助”作为江南文学繁荣发展、作品风格清新的客观条件，是颇有识见的。只是对“人物秀美”的解读，尚可从文化世家汇聚、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加以展开。

从历史文化版图上来看，中古以前黄河以北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学术文化发达，精英阶层萃集。但由于这一学术文化的高地同时也是政治集团利益角逐的重地，虏马胡将与汉廷权臣交替战乱，河北关中大好河山竟沦为左衽。这种情势反复轮回，恶性发展，带来的后果不但是政治颓败，经济崩溃，民生潦倒，同时以文明程度较高而著称的中原地区社会各阶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的分化，虽然一部分仍是礼教文明的坚持与守护者，但也有一部分逐渐“习性近于夷而疏于礼”^①。自永嘉之乱，终于出现了重大的文化裂变，开始了中原甲姓华族避乱南迁的历史过程。后来，再次经历了安史之乱和靖康之变的南渡，这一历史过程才大致宣告完成。

在中国文化史上，这一“历史过程”的完成是何等重大的事件！中原衣冠之族南来“避乱江东者十六、七”^②，所发生的决不只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数量变化。如果说在第一次永嘉衣冠南渡后，北齐颜之推所感伤的“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③是事实的话，随着更大规模的靖康渡江南迁的终结，建炎年间已经形成了“平江（治今苏州）、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④的局面。这种文化士族精英在江南的大汇聚，实际上宣告了

① 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中有“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之说，见《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177页。

②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③ 《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建炎三年。

中国文化中心的大转移。江南这一方土地在民族屡次蒙难中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拯救的责任,同时也获得了历史赐予的发展文化、创造文明的机遇。从此,江南这一过去荒落的文化“后院”,变成了华贵的文化“前殿”,乃至“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①。

江南文化家族正是借这种历史机遇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所说的“江南文化家族”,实际上包含了江南原住文化世族与南迁而来的衣冠之族,相比较而言,后者所占比重更大。在经历了长期“本地化”的过程后,许多南迁家族与江南原住世族一起在江南优胜的山水环境、自然生态中逐渐陶淑,滋长壮大,造成了人文蔚起的蓬勃兴盛局面,较之北方地区,确是气象万千,盈亏迥别^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人文教育的普遍重视和积累优势,使江南士子在“科举”这一“国家战略行动”中一次次绝对胜出,文化家族更如同青春树丛一次次拔地而起,拔节向上,最终形成了一片蓊郁而坚挺的森林。

清代江南文学正是这片家族文化森林的硕果盛葩,而诗文是其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因此从江南地域和家族角度切入清代江南诗文研究,将“地气”和“人气”统摄起来观照,就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了。所谓自然和必要,就意味着这种研究路径的方法实际上是问题(研究对象)自身所包含的,在本相上回避不了,在学理上绕不过去。尽管我们承认江南为文化高地,整体文学生态良好,即使

① 《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② 关于这个问题,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的《总论》中有一段精到的分析:“古代之时,北方之地水利普兴,殷富之地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启,文学易输。后世以将,北方水道淤为民田,而荆、吴、楚、蜀之间,得长江之灌输,人文蔚起。”(《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第178页)实际上,这一对南北文化之变的阐述,也可移之认识江南和中原文学之变。

一般布衣韦带之士,也不乏攻文吟唱、摘章染墨之能,清代江南文学确有相当一部分是寒族之作,他们同样也形成了某些群体性特征,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在清代江南真正以词章之业为尚,“欲凭文字播风潮”^①,主导文学发展方向和格局的,多为文化家族作家。而且,创作出影响深远的作品,为“文献之邦”建设作出卓著贡献,将名字深镌于文学纪念碑上的,同样仍多属文化家族作家。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整个清代文学研究,尤其对于了解清代诗文创作的成就,是非常必要的。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文学创作的高度繁荣,是作家扎根于现实社会生活,介入时代历史发展,同时得清嘉山水之助的结果,当然也与其“有图书子史充栋溢杼以资其朗读;有金石彝鼎、法书名画以博其见闻;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写其神情;烟风月露、莺花鱼鸟,揽结吞吐于毫素行墨之间”的风雅写作境况有关^②。我们要深入研究清代江南诗文,就不妨以观察地域性因素的姿态,不惟回到时代风云和社会生活之中,也回到那个地域,回到乡邦文献,回到文化家族的创作现场,追寻逝去的风雅,重拾江南的风流。

本书并不是我对清代江南诗文创作与地域、家族关系的系统阐述,只是近些年来所撰写的相关论文的汇集,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公开发表。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我近些年的学术兴趣,也体现出我对于江南地域、家族与文学发展关系的初步思考和探索。根据论文的内容,此次结集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江南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清代江南地域性文学群体研究”、“清代江南

① 柳亚子《岁暮述怀》,《磨剑室诗词集》,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石田诗钞序》。

诗文作家作品研究”。第一个部分阐述了我对地域、家族与文学发展关系的几点认识,第二、三部分主要讨论了虞山派、娄东派、云间派、梁溪文学集群、乾隆三大家和南社等文学群体以及清代江南文坛的一些作家。清代江南诗文创作成果至为丰富,地域、家族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也相当复杂,从事这一学术工作其道修远。目前,我正在努力作进一步探讨,也希望同仁们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总之,这本书只是一个初步的专题学术小结,而这个小结无疑更多包含着对批评的期待,也包含着对学界茂林嘉卉般研究景观出现的期待。

目 录

前言	1
----------	---

上编 江南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

江南文化型社会的基本构成	2
太湖环境与江南文化家族的演变	19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34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姻娅网络与文学创造力生成	50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雅集与文学创作	80
清代江南私家园林与家族文学发展	103
古典文献研究的家族学视阈	129
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	145

中编 清代江南地域性文学群体研究

清初江南文学版图中的诗歌流派	158
清代江南“九老会”文学活动探论	172
无锡家族文化与清代梁溪文学群体	184
清初虞山派之形成及其诗文化圈	211
清代虞山诗派的创作气局	225

清代虞山派诗学观分歧及其影响	240
清代虞山派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253
论蒋心余诗歌艺术特征兼谈“乾隆三大家”并称问题	265
南社百年与“南学”研究	283
南社虎丘雅集中的两个公案	296

下编 清代江南诗文作家作品研究

以全部生命力量来忏悔:再论钱谦益其人	302
钱谦益唐宋兼宗的祈向与清代诗风新变	314
钱谦益文学观转变及其批评的意义	329
宋存标《情种》资料渊源考辨	342
陈璧诗在清初的特殊意义	354
情到狂时烧破眼:论清初诗人钱曾	363
笔蘸惊涛情写愁:论清初诗人陆貽典	375
沈德潜江南园记的旨趣与品格	385
论阳湖陆继辂的古文创作	401
晚清刘鹗《铁云诗存》的精神世界	415
学人之诗的最后辉煌:读《沈曾植集校注》	434

【附录】

忆钱仲联师“梦茗庵”寓所授课	440
文人相亲:钱仲联与王元化	448
世纪学者钱仲联先生的最后时刻	453
后记	456



上编 江南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

